

华侨华人社团与会党组织中的关帝信仰——以新马地区为中心

李彦佚

摘要：除庙宇外，地缘性、血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以及会党组织的活动地点，也是海外华人崇拜关帝的主要场所，是观察关帝信仰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另一个窗口。通过对以新马地区为主的有关组织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它们的创建时间普遍比关帝庙早，加之多以“馆庙一体”、不对外开放的形式运作，故关帝在其中往往是“成员们的共同信仰和纽带”，具有“移民神”“祖宗神”“会党神”等神格形象，在维系组织运作、增进成员团结、改善成员生存环境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与此同时，虽然神格形象存在差异，但这三类华人组织选择供奉关帝的出发点，实质上是表达对关帝所代表的“忠心义气”精神的崇拜。

关键词：关帝信仰 华侨华人社团 华人会党组织 新马地区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5-0187(2024)01-0045-09

作为“忠义精神”的象征与化身，关帝不仅在中国受到普遍尊崇，也是华侨华人迁居海外后祈求庇护、长期崇祀并作为团结象征的民间信仰之一。除专门以关帝为主神的庙宇外，海外还出现了很多供奉关帝的华人社团和会党组织，它们创建时间普遍比关帝庙早，通常将关帝安奉于其活动场所或附属庙宇内，以“馆庙一体”或“庙宇会馆复合体”的形式运作，加之通常不对外开放、只允许其成员参与相关祭祀活动，导致二者所祀之关帝更多以“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纽带”的形象出现，并具有凝聚成员团结、倡导忠义精神之作用。^[1]

一、地缘性社团的关帝崇拜

以同乡关系（既有单一地域，也有多地域者）为纽带组建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如同乡会等），就是地缘性社团。据笔者观察，目前海外现存的诸多地缘

性社团中，就有许多以关帝作为成员之共同信仰者，使关帝在海外具有了“移民神”的形象。

以马来西亚马六甲惠州会馆为例，它由李振发等客家华人于1805年创建，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惠州会馆、第三间华族会馆”以及“叶亚来下南洋时的第一个落脚之地”。^[2]该会馆位于马六甲市豆腐街，其二楼目前仍供奉关帝，据说该关帝像的雕像时间“已超过150年”，一直被惠州会馆的成员们认可曾“庇护移民社会时代的先贤平安度过生活上的难关”。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关帝神龛上方有一块写着“义气”二字的匾额以及关刀等物（图一）^[3]，并在每年关帝诞（农历五月十三）以及中元节举办选举正副炉主等祭祀活动，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向会馆成员们强调关帝所代表的义气和团结精神。据学者研究，早年马六甲惠州会馆之所以会选择关帝作为成员们的共同信仰，既与当时惠州人在马六甲是“少数民族群，大的寺庙不一定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或菩萨”有关，

作者简介：李彦佚，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路重点实验室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8ZDA228）的阶段性成果。



图一 马六甲惠州会馆

也与关帝象征“忠义”以及是“大部分客家人的集体信仰，维系乡缘与会员感情及团结的纽带、象征”有关。^[4] 经过数百年的持续祭祀，关帝不但是增强马六甲惠州人凝聚力的“号召者”，也是这一群体的“帮群象征”之一。

除马六甲惠州会馆外，同处马六甲的雷州会馆、嘉应会馆、增龙会馆、应和会馆，以及马来西亚雪隆广肇会馆、雪隆惠州会馆^[5]、雪隆茶阳会馆、雪隆嘉应会馆、柔佛新山广肇会馆、檳城台山宁阳会馆、檳城中山会馆忠义堂、檳城顺德会馆、檳榔屿嘉应会馆^[6]、檳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列圣宫）^[7]等地缘性社团均供奉关帝或其神位。新加坡则有冈州会馆、丰顺会馆、惠州会馆^[8]、番禺会馆、东山励志社、应和会馆（由客家人开创于1822年）以及金门人开创之一系列会馆（如古宁同乡会、金岐山同乡会、金敦煌、金水同乡会附属之金水寺等。金长发联谊社虽以妈祖为主神，但兼祀有关帝）等同样供奉关帝的地缘性社团组织，它们大多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9]

其他国家同样有祭祀关帝的地缘性会馆，如据南海籍越南华侨潘绍远《粤东会馆碑记》记载，由“广东众商筹建”、1803年落成的越南河内粤籍华人地缘性会馆——河口坊粤东会馆同样供奉关帝，“上酬神灵，下敦乡谊”，而胡志明市的11个华人会馆中，有7个奉祀关帝，会安、顺化均有奉祀关帝的广肇会馆。^[10] 又如，日本横滨中华街关帝庙、神户关帝庙、神户中华会馆、函馆关帝庙等均是地缘

性华人社团，前两者是当地中华会馆的附属机构，而后两者则是“馆庙一体”，其中函馆关帝庙还是日本现存唯一纯中国庙宇式样的中华会馆。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目前仍分别保留一座由当地四邑同乡会、四邑会馆管辖的关帝庙，二者均超过百年历史，至今仍香火鼎盛。印尼华人、甲必丹戴亮辉（漳州南靖县人）于1824年创建的雅加达南靖庙，也是地缘性社团“南靖公会”的馆址，“为乡人提供安身之所”^[11]。而在非洲地区，由福建移民陆才新倡建，福建、客家、南顺三个族群一同参与兴建并于1842年落成的毛里求斯路易港拉沙鳞关帝庙，也曾是当地客家人地缘性社团仁和会馆的聚会和议事地点，后在王雁宾、朱棠、李梗光、王德禄等人倡议下，于1874年集资兴建了拉沙鳞关帝庙的分庙“关平庙”（取关平是关公之子含义），并以其作为仁和会馆的新馆址。而由南海、顺德人创立于1859年的毛里求斯南顺会馆，也从1902年开始奉祀关帝，至今该馆成员仍有“由逝者长子或嫡亲在葬礼后到关帝庙上香，以便日后祭拜”^[12]的习俗。

海外祭祀关帝的华侨华人地缘性社团不仅数目众多，且馆内关帝均具有“移民神”的形象，他不仅是成员们的共同信仰，还是有关同乡群体聚会议事、互相扶持、联系乡谊、增进感情的象征，其所代表的忠义精神也十分契合有关地缘性社团成立的宗旨和目的。另外，除新加坡东山励志社（漳州人）、新加坡金门人创建的一系列地缘性社团以及印尼的雅加达南靖庙外，这些地缘性社团基本上都由广府人或粤籍客家人开创（福建人则以创办庙宇居多），不能不说此种供奉方式乃是海外关帝信仰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马来西亚广府人的地缘性社团为例，目前该国现存祭祀关帝最为有名的相关社团是雪隆广肇会馆和檳城宁阳（台山）会馆，二者所辖的关帝庙也是海外少见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庙宇会馆复合体”。雪隆广肇会馆关帝庙在赵煜、王春临等广肇两府华人的倡建下于1888年建成，虽然供奉关帝的地方当年也是广肇会馆的正面大堂（目前广肇会馆已搬到关帝庙对面），但因其向公众开放，且每年也会举办

春秋二祭和关帝诞（农历六月廿四）活动，导致后来“善男信女只知关帝庙而不知广肇会馆”。而开创于1833年的檳城台山宁阳会馆武帝庙，虽然只是该会馆（1827年倡建）的“辅祠”，且当年该会馆成员选择关帝作为其共同信仰的具体原因已无从考证，但因该武帝庙对公众开放，“不限定只有台山人才能上门膜拜”，加之早年台山人多从事打金行业，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在“以粤帮族群为主的义兴帮会组织里位居权力中枢，掌握了该帮会组织的核心领导权”，因此该庙不仅香火鼎盛，还享有“乔治市乃至檳城关帝信仰总坛的地位与核心位置”，“许多奉祀有关帝的民间神坛善信，每每也会到武帝庙进香”。^[13]又如，在新加坡广府人的地缘社团中，有182年历史、以关帝作为本馆成员共同信仰的冈州会馆，是其中最著名的社团。该会馆不仅自创立之时就供奉关帝，每年农历六月也会举行庆祝关帝诞活动，以祈“同乡之间能传承桃园结义那种重义气的精神，互相扶持，团结一致”^[14]。

至于“祭祀关帝之华侨华人地缘性社团以广府人会馆为多”的现象出现的原因，目前尚无明确定论，结合笔者实地走访等材料看，可能是与福建侨乡地区普遍造庙供神（以福建安溪的关帝信仰为例，诸如聚星楼、七寨庙、铜锣庙、登虎榜关帝庙等庙宇，就都建在当地村落之内，且在新马地区均有其分灵庙宇^[15]），广东侨乡地区多建祠祭祀祖先，以及早年华人会党组织多会祭祀关帝、以之为“会党神”的习惯有关。

二、血缘性社团的关帝崇拜

海外华侨华人以“姓氏”为单位组建的社团称为血缘性社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馆址供奉一尊与本姓氏有关的神明，作为成员共同的“祖宗神”。杜忠全指出，由于华人血缘性社团对于“源出先祖的神格化”构成了“会馆组织之信仰中心”，因此，无论参与此组织的成员的祖籍在哪里，都会基于大家的共同姓氏而尊奉中国历史上某一名人为其“祖先”并在馆址内为之设坛祭祀，如马来西亚檳城本头公

巷的石塘谢公司就以东晋名臣、“王孙大使爷”谢玄为该馆谢姓成员的共同祖先，并在馆址内设坛供奉。^[16]至于本文所讨论的关帝，在海外也有被血缘性社团视为“共同祖先”加以供奉、赋予“祖宗神”形象的情况，其代表主要有由刘关张赵四姓共同组成的“龙冈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宗亲社团。

（一）龙冈组织

龙冈组织在东南亚、美洲分别被称为“刘关张赵古城会”和“龙冈亲义公所”，其分支遍布多国，历史源头可追溯到位于广东开平的龙冈古庙。清康熙元年（1662），当地刘姓宗族面临土地纷争，因自身力量不足，遂根据《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赵云“会古城主臣聚义”的故事，邀集关、张、赵三族协商共建龙冈古庙，庙内祭祀前述四将，四族定期举行春秋二祭和四贤宝诞祭，并以庙宇为四姓宗亲商议事务之所。^[17]

后来，从此地移民出洋的四姓华人，又将龙冈这一组织、精神、风气带到海外，如新马两国目前有吉坡、檳城、威省、浮罗、雪隆、霹靂等15个龙冈宗亲组织以及马来西亚龙冈亲义总会（1967年创建），其中新加坡、檳城的刘关张赵古城会均成立于1873年（后者更是“全马最古老的一座异姓宗祠”），霹靂刘关张赵古城会成立于1925年，雪隆刘关张赵古城会成立于1950年，拥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18]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欧洲也有四姓华人开创的龙冈组织，如赴美的四姓华人1871年在旧金山布碌港建造了龙冈古庙，1910年起又陆续在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纽约、西雅图、夏威夷、凤凰城等地创建作为四姓侨胞联络中心的龙冈公所或亲义公所。1928年全美龙冈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洛杉矶举办后，之后四姓宗亲将前述两公所合并为美洲龙冈亲义总公所。^[19]

与开平龙冈古庙一样，海外龙冈组织也会在其馆址内供奉作为四姓成员“先祖”的刘备、关羽、张飞或赵云的神龛，并定期举办相关神诞或祖先祭祀活动。例如，坐落于檳城乔治市的刘关张赵古城会除了为已故的四姓成员在广汀义山修建总坟、举行春

秋冬三祭外，还会在农历正月二十七、六月二十四、八月初八、九月初九为刘关张赵举办“先祖诞辰祭祀”，四姓宗亲汇聚“四祖先”神坛前举行进香献祭和聚餐活动，延续其创始之初就已立下的传统。其中，因作为“关氏祖先”的关羽演变为“蔚为大流”的关帝信仰，加上关帝信仰所蕴含的“义”也是维系海外四姓结义关系的纽带，故该会对关羽诞辰最重视，每逢此日皆会举办隆重活动。不过，无论是寻常日子还是关帝诞辰，槟城刘关张赵古城会都“不会开放予外人膜拜”，只当作“族人聚会活动与向先祖烧香致意的场所”。^[20]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海外龙冈组织不仅没有规定只允许来自开平、台山、恩平、鹤山地区的四姓人士参加，还与中国港台等地区的龙冈组织一道组建了跨地域、全球性的“世界龙冈亲义总会”，并定期进行区域性或世界性恳亲大会，以此来加强全球四姓宗亲之间的联系。同时，海外龙冈组织与作为祖庙的开平龙冈古庙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在走访开平龙冈古庙时，见到许多海外四姓宗亲或龙冈组织给该庙捐助的壁画、香炉等物，墙上则挂着不少海外宗亲参访龙冈古庙的照片，很多捐款碑上也刻着海外四姓宗亲及相关龙冈组织的名字，这些均是海外龙冈组织不忘根本、与祖庙保持密切联系的体现。

总的来说，龙冈组织这一基于“虚拟血缘关系”的多姓氏华人血缘性社团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与成员们所长期秉持的、与关帝信仰所倡导之“忠、义、仁、勇”核心价值高度一致的“龙冈精神”有关。所谓龙冈精神，就是“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见危受命之谓勇”，它们合起来正好就是“忠义仁勇”四个字，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龙冈组织四姓成员加强联系、保持团结的“精神纽带”与“法宝”。

（二）其他相关血缘性社团

海外很多由关姓华人开创的血缘性社团，同样有设立关帝祭坛、以关帝作为本社团成员共同“祖先”与团结象征的习惯，如马来西亚关氏公会、印尼关氏宗亲总会、泰国关氏宗亲会、越南关氏大宗祠、加拿

大安大略省关氏宗亲会、美国新英伦区关氏宗亲会、加拿大温哥华关陇西堂、美国旧金山的关氏公所和开平光裕堂、美国洛杉矶关光裕宗亲会等。其中，有的关氏宗亲会本身就是龙冈组织的一部分，如马来西亚关氏公会。在组建马来西亚龙冈亲义总会的过程中，筹委会主席刘文认为，在当时已成立刘张赵三姓宗亲组织的情况下，没有关氏宗亲组织会导致“龙冈总会的组织成员会不齐全”，便向关氏族人提出筹措此组织的建议，关氏便推举原籍莆田的关光明负责筹建此组织。1969年9月，关氏公会成立，关光明任会长，并于1976—1981年间出任龙冈亲义总会总务、1979年担任雪兰莪刘关张赵古城会第十五届主席，由此确立了关氏公会与马国龙冈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由马来西亚永定胡氏安定堂与鼎美胡氏敦睦堂合组的马来西亚胡姓华人血缘性社团“槟城帝君胡公司”，虽然成员并不姓关，但他们依然将关帝与“祖先念八郎公以及祖婆”供奉在一起，同时尊二者为“祖宗神”，以此来“联络族人感情，谋族人福利”，笔者推测这与关帝之妻姓胡有关。^[21]可见，无论是龙冈组织、关姓组织，还是槟城帝君胡公司这类并不姓关的血缘性社团，其祭祀关帝的习俗都有着明确的历史渊源，并都与“忠义”二字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创建者对关帝的尊崇以及以其凝聚成员、鼓励彼此互相帮助的目的。

三、华人会党的关帝崇拜

（一）华人会党组织

海外华人会党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经济互助色彩浓厚但后期演变为黑社会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民间秘密团体”，原本是中国民间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有观点认为其创建于铜陵关帝庙的所在地漳州东山岛），后因清政府打压导致成员外逃，之后随着中国移民海外活动增多，以及海外饷码、港主等制度的推行从中国走向海外，最终演变成今日之海外华人会党——“洪门组织”。^[22]

华人会党通常都被认为是从事非法勾当的“黑社会”，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会党组织的最初创建，既是为了在海外延续天地会组织，也是为了实现团结互助、帮助同乡、反抗异族歧视压迫等，发挥“团结互持”的作用，因而带有鲜明的“兄弟会”性质，有的还曾在当地政府注册为合法社团。以新马地区为例，19世纪两国就曾出现过义兴、松柏馆、义福、福兴、广福义记、海山、建德（又称大伯公会）、一堂馆、粤东馆、存心、和顺、洪顺堂、福明、协发、龙山等华人会党，它们不但广布各地、成员众多，还有不少上层人士参与其中，如参与创办雪隆广肇会馆的叶观盛（吉隆坡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陆佑、赵煜等人，同时也是华人会党的成员。现在分布于东南亚、美加、澳大利亚、拉美、欧洲等地的“洪门致公堂”，也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华人会党。^[23]

历史上，海外华人会党曾为当地社会发展以及维护华人利益做出贡献，如槟城义兴公司曾在1854年捐建医院（今槟城中央医院）并为当地大英义学提供奖学金，本迪戈的义兴公司则曾领导当地华人矿工反抗白人的种族压迫。不过，后来部分会党组织（主要是东南亚的会党组织，澳大利亚并没出现此种问题）或是因“华社内部结构、职业分工与财富分配存在不平衡，劳动过程中沾染恶习、流氓地痞混入、商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将会党变成个人控制劳动力与攫取财富的工具”等原因发生分裂而趋于变质（如槟城义兴公司先后分裂出海山、建德两个会党），并为争夺诸如鸦片、妓院、华工输入、挖矿等暴利行业的利益而进行大规模械斗（如霹雳拿律战争、槟城十日暴动等），或是因当地原有产业（如本迪戈的淘金业）逐渐萎缩导致当地被华人放弃，最终被当地政府镇压取缔或转型为合法慈善组织，或作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而延续下来。^[24]

（二）华人会党供奉关帝的情况

尽管华人会党组织存在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确实在海外华人社会发展中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影响——其中推动和传播关帝信仰就是重要体现。

据笔者调查，早年大多数华人会党组织都崇拜关帝，以之为“会党神”。王琛发指出：“在会党势力退居幕后的年代，会馆奉祀关帝是延续过去的传统。”^[25]一些关帝庙的创建也被认为与会党有关，如部分泰国关帝庙就是如此。事实上，当年这类组织之所以会被冠以“秘密”二字，其中一个原因就与他们以“崇拜关帝等神明的组织”作为掩护，并设计了很多至今仍秘而不宣的宗教与入会仪式、手势帮规等，令不明白其中含义的当地政府感到忌惮有关。^[26]

至于关帝被尊崇为会党神之一的根本原因，与他所具有的鲜明的“忠义”形象契合会党组织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关：一方面，他们的活动——无论是以武力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歧视压迫，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其他华人会党发生武力冲突，都决定了他们必须保持内部团结与高度纪律性，严防出现叛徒；另一方面，会党成员从富商、甲必丹这样的上层人士（主要充任首领等高层）到小摊小贩、矿工甚至无业游民（多担任普通成员），身份差异较大，这就可能产生恃强凌弱的问题，进而引起内讧。^[27]于是，各华人会党组织便将象征“忠义”的关帝列作“确保成员入会后遵守誓约的楷模”与“共同精神偶像”，并与之进行“秘密或公开形式”的结合，以此来提升成员的忠诚程度、彰显其结社的精神与宗旨。^[28]

以新马两国的“义兴公司”为例，因关帝代表了“忠义精神”，以及“义”字在很多方言中发音（最初义兴公司的成员并没有籍贯之分）与“二”（关帝一般也被称为“关二哥”）一样。据槟城宁阳会馆青年团团团长朱学豪介绍，曾被用作槟城义兴公司活动场所的名英祠，当年用作公开部分的前殿即为一关帝庙（图二）^[29]，供奉手拿《春秋》的关帝以及周仓、关平，当时义兴公司的成员们会定时以烧猪、鸡、烧鸭三牲祭拜之。另外，马六甲的惠州会馆、增龙会馆、应和会馆三个客家人会馆之所以至今仍在供奉关帝，也被认为与早年义兴公司尊崇关帝的做法有关。^[30]又如，位于槟城广福宫旁、1881年由海峡殖民地总



图二 檳城名英祠内的关帝祭坛

督弗雷德里克·韦尔德赠地兴建的平章会馆（现名槟州华人大会堂），因最初是在“英殖民统治者策动下成立”、接替广福宫发挥“调解华侨的私会党争与民间纠纷”作用的机构^[31]，为表达“各帮群共同服膺关公信仰蕴涵的价值教导”，郑嗣文、许武安、邱天德等创建者不仅在馆内供奉关帝，还于1894年以此关帝“夙昔灵应”为名请得清朝光绪皇帝御书匾额一方。^[32]

除新马两国外，其他国家的华人会党同样有尊崇关帝、以之为会党神的习惯，如印尼西婆罗洲曾有兰芳公司、三条沟公司等华人会党祭祀关帝。修建于1985年的菲律宾马尼拉加洛干黎刹大街“菲华通淮庙”的关帝神像，早年从通淮关岳庙“分香而来”并曾长期供奉于当地民居内，但因此庙的创建者以及半数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均是“菲律宾洪门致公党党员”，使该庙在“继承早期庙宇与会党相互促成的传

统”的同时，实现了与“会党神”关帝的“公开结合”。前往澳大利亚本迪戈淘金的四邑华人，因“面对白人的压迫欺负”而于1856年组建“义兴公司”时，一道建立了供奉关帝的“致公堂（大金山庙）”，以之作为号召大家进行反抗的精神象征。美国波士顿洪门致公堂主席余丽嫫于2021年第三次连任主席时，曾特意在关帝神位前切金猪“敬告”此事，这反映了关帝信仰对此组织的影响之深以及成员们对关帝的虔诚。^[33]

（三）华人会党日常运作中的关帝元素

除了供奉关帝外，海外华人会党日常运作中使用的手势、暗语（此二者主要用于识别身份）、入会仪式与帮规等，均含有关帝元素或“必须尊崇关帝”的要求；在不同场合祭拜关帝时，也有相应的唱词和动作。据马来西亚洪门总会一位俞姓老前辈介绍，洪门祭拜关帝“本来就没有特别仪式和手势，是后来关帝成为洪门崇拜人物，才被用来辨识身份地位象征，由会员自创出来”。

以马来西亚会党组织为例，檳城义兴公司成员间用于打招呼兼表明身份、排除“假冒成员”的“三把半香”手势暗号中，无名指所代表的“第二把香”就是指“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马来西亚洪门总会目前仍在使用的“不可外传的、焚香祭拜关帝的全套手势和暗号”中，就包括唱词以及“代表‘天地人’含义的祭拜手势、双脚走八卦、举香悬空写‘忠心义气’四个字”等动作。马来西亚“新山关公文化之旅考察与交流团”的许进国称，当地华人会党祭拜关公的方式是“点香时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在下、拇指在上，供香时要先在空中打个‘忠’字再插香”，并有“以八卦阵方式走三步，再举左脚分别向左、右和后点三下，再跪下叩拜”的动作。此外，笔者在马来西亚进行实地走访时，曾看到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洪门中人祭拜关帝的视频，当中除了有专门的手势、步法外，还有一段闽南话唱词，其内容主要是歌颂关帝、关平、周仓的忠心义气，并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意。经当地人翻译并获得“可以公开部分内容”

的许可后，笔者摘录如下：

忠义堂前拜关公，朝拜关平拜周仓。
桃园结义三英将，尽忠扶汉第一功。
一拜关帝圣帝君，二拜关平神为尊。
三拜周仓忠义勇，合拜洪家忠义堂。

另据王琛发研究，不仅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洪门二房系统”在“后期流行的会香诗句”中有“今晚新香会旧香，桃园结义刘关张”一句，而且会党成员在点燃他人奉上的生烟时，也会念诵“五人盖火不见洪，请起五祖见关公”等含有关帝元素的暗语，“以此来向对方表明身份”。荷属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以“特斯曼提供给巴达维亚学术院的两部会簿”以及“荷兰殖民当局查获的华人天地会内部资料”为基础完成的研究成果中，也提到当地华人会党规定每个成员须在关帝诞“献七十二钱”，否则会收到相应惩罚。^[34]这些现象不仅表明“会党神”关帝是有关会党组织的标志与内部共同信仰，而且也表明关帝信仰深度融入这些组织的日常运作中。

结 语

无论是在新马地区还是在海外其他国家，我们都能找到许多祭祀关帝的地缘性、血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以及华人会党组织：地缘性社团以“馆庙一体”或设立附属的庙宇供奉关帝，他们多为广府人、粤籍客家人，关帝在其中具有号召团结、增强成员凝聚力的作用，以“移民神”的形象出现；血缘性社团则均以“馆庙一体”的形式祭祀“祖宗神”关帝，虽然并不是所有此类社团都纯粹由关姓华侨华人组成，但关帝在其中的作用与地缘性社团相同；“会党神”关帝作为会党成员的共同信仰，以其所代表之“忠义”精神维系着内部团结，并深度融入会党运作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虽然神格形象存在差异，但上述三类华人组织选择供奉关帝，要求成员们以之为共同信仰的出发点，或者说希望其成员学习、延续的精神内核，实质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关帝信仰所代表的“忠心义气”精神。

（责任编辑：兰 维）

注释：

- [1]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第180页。
- [2] 《马六甲惠州会馆212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马六甲惠州会馆2017年。另有部分资料来源自笔者的实地调查。
- [3] 笔者2023年5月16日拍摄于马六甲惠州会馆。
- [4]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29页。郭平兴：《20世纪前马六甲惠州会馆研究》，《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马六甲惠州会馆212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马六甲惠州会馆2017年。部分资料来源自作者2023年5月16日在马六甲惠州会馆的实地走访。
- [5] 雪隆惠州会馆于1864年由叶亚来创建，原名“惠州公司”，是当时惠州南来乡亲的“初到落脚处”，于1889年开始供奉关帝。
- [6] 槟榔屿嘉应会馆于1881年建立，建立之时就在“旧会馆馆舍……下堂……楼下供关帝神像”，并曾采用“由关帝判定谁能负责祭祀和管理会务”的“头家炉主制度”；后因此制度“流弊日生”，从1921年起改以董事部代替。
- [7] 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于1798年创建，最初是一个没有会所的管理公塚组织。1919年8月，拥有四间店铺、“向办有孟兰会并建醮有列圣官神位一座”的广东广货行，将其业权全部赠给该组织作为会所，列圣宫也随之并入——所谓“列圣”者，指的就是关帝。
- [8] 1930年，新加坡惠州会馆会长把关帝像迁往新加坡福建街45号会所奉祀，“直至如今仍香火不断”。
- [9]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33页。杨松年、谢正一主编：《世界的关帝圣君：第七届世界华人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17年，第19页。王琛发：《先贤、神圣香火、开拓主权：华南原乡与南洋信仰版图的互相呼唤——以马来亚客家先民为主例》，《客家研究辑刊》2012年第1期。高静宜、陈中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广肇会馆关帝诞初探》，《八桂侨刊》2019年第4期。蓝昌武等：《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1987年。《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二百周年纪念特刊》，1998年。钟天详等：《新加坡惠州会馆20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惠州会馆2022年，第51、194-195页。部分资料来源自笔者在雪隆广肇会馆、槟城台山宁阳会馆、柔佛新山广肇会馆的实地走访，以及《南洋商报》《联合早报》的相关报道。
- [10] 谭志词：《关公崇拜在越南》，《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严艳：《17—19世纪粤籍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在越南的传播与流变》，《越南研究》2020年第1期。叶少飞：《诚荐馨香：越南阮朝河内的关帝信仰》，《南方华裔研究杂志》2021年第9卷。Sophie Couchman, Melbourne's See Yup Kuan Ti Temple: A Historical Overview,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9, 2019, pp.50-81。

- [11] [日]渡边义浩著,李晓倩译:《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00页。郑一省:《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67页。童家洲:《试论关帝信仰传播日本及其演变》,《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葛继勇、施梦嘉:《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吴伟明:《近世日本关帝信仰初探》,《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2017年第9期。“尚书省三国志部”博客:<https://kyoudan.hatenablog.jp/>,2023年8月18日。
- [12] 李安山:《论清末非洲华侨的社区生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安山:《试析二战以后非洲华人宗教意识的变迁与融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李安山:《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1950—2016)》,《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夏远鸣:《从侨居团体到国民团体——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变迁》,[日]河合洋尚、张维安编:《客家族群与全球现象》,“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2020年,第83—102页。
- [13]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84—185页。高静宜:《吉隆坡广府与客家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广肇会馆与惠州会馆为视角》,马来西亚拉曼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 [14]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75—176页。曾玲:《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陈伟华、黄丽贤等:《庇能台山宁阳会馆建馆一百八十三周年纪念特刊》,庇能宁阳会馆2014年,第101—106页。部分资料来源于笔者与槟城台山宁阳会馆青年团团团长朱学豪、委员余本之的访谈记录。
- [15] 资料来源于2022年8月16—20日笔者在福建安溪的实地走访。
- [16]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80页。
- [17] 笔者2021年3月25日在开平龙冈古庙实地考察所得。
- [18]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79—180页。关英才等:《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一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馆特刊委员会2003年。部分资料来源于2021年3月25日笔者在开平龙冈古庙实地考察时获赠的《龙冈古庙(简介)》小册子。
- [19] 《印度尼西亚龙冈亲义总会成立 首届理监事就职(图)》,中国侨务网:<http://www.chinaqw.com/hqhr/2014/10-09/20714.shtml>,2014年10月9日。部分资料来源于2021年3月25日笔者在开平龙冈古庙实地考察时获赠的《龙冈古庙(简介)》小册子。
- [20] 王见川、[马]苏庆华、[马]刘文星:《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第180—183页。
- [21] 《槟城华人大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 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3年,第284页。
- [22] 潮龙起:《空间迁移与地位变迁——十九世纪闽粤天地会与马来半岛华人会党的比较》,《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
- [23]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30—231、249页。吴豪德:《洪门的演变与当今海外洪门组织》,《侨园》1998年第1期。徐进功:《论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邱格屏:《新马华人秘密会党社会构成之探讨》,《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潮龙起:《空间迁移与地位变迁——十九世纪闽粤天地会与马来半岛华人会党的比较》,《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李益杰:《19世纪广东潮汕海外华侨秘密会党初探》,《东南亚》2007年第1期。宋海群:《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兴盛之原因探析——以社会心理学为考察视角》,《文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槟城华人大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 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3年,第135页。
- [24] 蔡少卿:《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67页。宋海群:《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研究》,赣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徐进功:《论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张健:《论十九世纪新马华人私会党兴盛的原因》,《八桂侨刊》2006年第3期。部分资料来源于笔者在马来西亚槟城名英祠、马六甲峇山宫、新山义兴馆等地的实地调研。
- [25] 王琛发:《先贤、神圣香火、开拓主权:华南原乡与南洋信仰版图的互相呼唤——以马来亚客家先民为主例》,《客家研究辑刊》2012年第1期。
- [26] 笔者团队与马来西亚姓氏宗联委秘书、传承者主席、田野调查工作者郭素岑的访谈记录。
- [27]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253—255页。宋海群:《19世纪新加坡华人会党研究》,赣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邱格屏:《新马华人秘密会党社会构成之探讨》,《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
- [28] 濮文起:《关羽:从人到神》,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95—402页。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2011年“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暨皈依科仪研讨会”,中国台湾。
- [29] 笔者2023年5月13日拍摄于槟城名英祠。
- [30] 笔者团队2023年5月17日与马六甲峇山宫苦力前辈的访谈记录整理所得。
- [31] 1800年始建的槟城广福宫曾十分积极参与调解各华人会党间的矛盾,举行过“由观音菩萨见证的息争仪式”,但还是无法阻止1867年槟城十日大暴动以及1873—1874年第三次拿律战争的爆发,成为平章会馆兴建的滥觞。资料来源于2023年5月14日笔者在槟城广福宫的实地走访。
- [32] 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2011年“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暨皈依科仪研讨会”,中国台湾。吴龙云:《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及槟城华人社会:廿世纪初期的帮群、领袖及其互动》,新加坡国立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槟城华人大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 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华人大大会堂1983年,第135—136页。槟城华人大大会堂官网:<https://www.pcth.org.my/index.php/>,2015年8月31日。
- [33] 李欣祥:《消逝的海外华邦:西婆罗洲华人政权的兴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7、164—165页。陈衍德:《试论菲律宾华人的宗教组织》,《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蔡少卿:《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2011年“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暨皈依科仪研讨会”,中国台湾。
- [34] [荷]施列格(Gustave Shclegel):《天地会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7页。王琛发:《桃园结义:南洋天地会对关帝信仰的继承、传播与影响》,2011年“关帝信仰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暨皈依科仪研讨会”,中国台湾。

The Worship of Guandi among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Focusing on the Singapore-Malaysia Region

Li Yani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emples and shrines, the places where geographically and kinship-based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hold activities also serve as significant locales for worshipping Guandi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ese locations provide another window for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andi's worship abroad.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the Singapore-Malaysia region, we find that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were established before the temples of Guandi. Moreover, because they have often operated in the form of "association-temple integration" and with limited access, Guandi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common belief and bond" among their members. He is imbued with roles such as the "god for immigrants", "ancestral god" and "god for societies", which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enhancing member solidarity, and improving members' living environments. At the same time, despite variations in his godhead,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for these three types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to worship Guandi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 spirit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associated with Guandi.

Keywords: Guandi Belief, Chinese Organizations, Chinese Societies, Singapore-Malaysia Region